

日本内阁文库藏清初《进士三代履历便览》考略 ——兼论清代科举录的刊刻、阅读与收藏

陈 晨

内容摘要: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清初《进士三代履历便览》,内含顺治、康熙两朝二十五科进士履历便览及三科登科录,可补国内所藏之缺,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本文在考察诸科履历便览编刻情况的基础上,讨论此部连续性题名文献对于科举史及清初政治、人物研究的意义;并以清初履历便览为中心,讨论清代士人对本朝科举录的收藏与阅读情况。

关键词:清代 科举录 履历便览 内阁文库

清代各级科举考试后,包含中式者相关信息的题名文献即陆续梓行,其中进士题名文献尤为士人所重。此类文献名目不一,就刊刻者而言,大致可分为由官方按制刻印的登科录、由中式者纂录的同年齿录以及由书坊刻印的进士三代履历便览(简称“履历便览”),内容亦详略各异。国内所藏清初科举题名文献,以履历便览为大宗,学者多据此考订进士名录或生平^①。遗憾的是国内所藏并不完整,顺治朝历科皆存,康熙朝共存十科,且散藏于各处^②。日本内阁文库藏有一部《进士三代履历便览》(简称“文库本”),包括顺治三年至康熙五十二年诸科(缺顺治四年丁亥科),以及康熙五十四年至六十年三科登科录。日藏本不仅可补数科之缺,其版本亦与国内藏本不尽相同,惜尚未有学者论及。本文即以此本为中心,考辨诸科便览的刊刻情况,进一步探讨此类题名文献的编刻、流转、收藏与阅读,以及其作为连续性题名文献对于清初政治制度、科举史研究的价值。

①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文献概述》,江庆柏编著:《清朝进士题名录》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41-50页。马镛、吴宣德:《两种善本〈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会试进士三代履历便览〉之比较》,《图书馆杂志》2009年第11期,第70-73页。

②国内收藏情况详见第二节附表。

一、版本与刊刻情况

清代进士履历便览依进士籍贯编排,自直隶顺天府始,先旗人后民籍,分省、分府依次列出进士的字号、治经、生年、籍贯(或旗籍)、乡会试及殿试名次、所授官职、家状等信息。文库本《进士三代履历便览》(史部七〇函第九号)凡31册,实含文献28种,系红叶山文库旧藏,后转藏内阁文库,统以今名著录。封面签题“登科录”,下有楷体墨书某年某科及册数。其中前25册分别为顺治朝丙戌、己丑、壬辰、乙未、戊戌、己亥、辛丑七科,以及康熙朝甲辰、丁未、庚戌、癸丑、丙辰、己未、壬戌、乙丑、戊辰、辛未、甲戌、丁丑、庚辰、癸未、丙戌、己丑、壬辰、癸巳十八科,共计二十五科履历便览,每册一科。第26至31册则为康熙末乙未、戊戌、辛丑三科登科录。每科两册,分前后卷,前卷为玉音、恩荣次第,后卷按殿试名次编列进士的籍贯、治经、字某、排行、年龄、家状、科甲名次等信息^①。

现存最早的坊刻履历便览为明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②。明代两京皆有刊行履历便览的书坊,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履历便览为“南京三山礼拜寺对门武林新宅”所刊,而崇祯十六年癸未科履历便览则由北京“正阳门里东城墙下红字牌溧水张家”刊行^③。明清易代后,虽然坊刻履历便览的体例与版式大致仍延续明代的传统,但刊刻者有所变化,南京刻本不复存在,北京刻本则主要转由洪氏书坊刊行。就文库本与国内现存诸本来看,凡标明刻印书坊者,均为洪氏刻本。文库本康熙九年庚戌、二十一年壬戌、二十四年乙丑、二十七年戊辰、三十年辛未、三十三年甲戌、三十六年丁丑、三十九年庚辰、四十二年癸未、四十五年丙戌、四十八年己丑、五十一年壬辰凡十二科履历便览,均在首页书名下以单行小字标识刊刻者(庚戌科为双行)。庚戌、壬戌两科为“指日高升洪铺梓行”,壬戌以后诸科则改“洪铺”为“洪氏”。另外,除庚戌、辛未两科外,其余十科履历便览均在记录顺天府进士信息的首页出现同样的标识。似可推测,洪氏书坊在顺治、康熙两朝十分活跃,几乎垄断了履历便览的刊刻。

事实上,洪氏书坊在晚明业已开始刊印与职官、科举相关的题名文献,

①其中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科、二十七年戊辰科、三十年辛未科、三十六年丁丑科、四十五年丙戌科、四十八年己丑科、五十一年壬辰科、五十二年癸巳科,凡八科进士三代履历便览,以及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科、五十七年戊戌科、六十年辛丑科三科登科录为孤本。

②《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第3册,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22页。

③邵懿辰:《明万历戊戌至国朝康熙壬戌进士履历跋后》“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中国科举录汇编》第14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年,第536页。

清人韩泰华即收藏数种,“自明以来,缙绅、齿录俱刻于京师西河沿洪家老铺,余藏有嘉、隆至康熙朝四十餘册,会试齿录犹是洪氏汇集所印”^①。洪氏书坊在明代时位于北京正阳门里东城墙下,清初迁至正阳门外西河沿,一度颇为兴盛^②。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履历便览书末牌记云:

正阳门外西河沿中指日高升洪家,刊刻历科三代进士履历,小铺亦有官板高头缙绅、戎政、儒林、皇华便览、各直省举人拣选履历,荣选之日添刻缙绅,名号、籍贯俱全。^③

可知此时其书坊已有相当规模,经营范围有所扩大,涵括各类职官与科举题名文献^④。文库诸本中刻有书坊牌记者计五种,以此科年履历便览为最早。其后牌记中关于书坊刊刻范围的信息递有增补,“直省举人拣选”的内容先后改作“各直省举人拣选考职题名”、“各直省举人拣选题名、考职名次”、“各直省举人拣选题名、考职、截取名次”^⑤,内容日益丰富。洪氏书坊经营日盛,“俨然南宋建之勤有堂、杭之陈解元书铺”^⑥,至康熙末期,书坊又于牌记中增刻“凡赐顾者详认招牌为记”^⑦字样,或系仿造之书渐出之故。

清人曾推测履历便览于雍正、乾隆年间废止不刻^⑧,这正可解释何以现存进士履历便览止于康熙末年,雍乾以降不复见。而正是在雍正年间,北京刊刻题名文献的书坊布局渐有所转移,原由洪氏书坊梓行的缙绅录,在此前后改由新兴于琉璃厂的书坊刊印。由于并无乾隆朝相应刻本存世,科举题名文献的情况不甚清楚,不过至迟在嘉庆初年,此类文献亦由琉璃厂书肆印

①韩泰华:《无事为福斋随笔》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11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页。

②马子木:《国家图书馆藏顺康缙绅册》,《历史档案》2018年第2期,第129-133页。

③《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会试一百五十九名进士三代履历便览》,日本内阁文库藏,史部七〇函第九号。

④康熙中,孔尚任作《桃花扇》,述马士英、阮大铖共撰迎立福王表文,便取“西河沿洪家高头便览”参考(《桃花扇》第十五出《迎驾》,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3页)。足见当孔氏之时,洪氏刻本的缙绅录仍是流通最广的版本。

⑤分见《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会试三百名三代进士履历便览》、《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会试一百六十二名进士三代履历便览》、《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会试三百三名三代进士履历便览》,日本内阁文库藏。

⑥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卷三《纪晓岚尚书藏顺治十八年缙绅跋》,《续修四库全书》第1476册,第710页。

⑦《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会试一百九十五名三代进士履历》,日本内阁文库藏。

⑧邵懿辰:《明万历戊戌至国朝康熙壬戌进士履历跋后》“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中国科举录汇编》第14册,第537页。

行,嘉庆七年壬戌科会试齿录由“京都杨梅竹斜街文茂斋穆毓修刻”;至光绪年间,琉璃厂版子庙会文斋、龙云斋、篆云斋、聚元斋亦成为刻印科举录的中心^①。洪氏书坊对晚清士人而言已相当陌生,俞樾便慨叹“西河沿洪家老铺久无闻矣”^②。

现存诸本履历便览中,既有殿试当年刊刻者,亦有后续经过增补的版本。此因书坊编刻履历便览时兼重信息传递的时效性与连续性,故不免有递刻的情况。书坊后续补入的信息主要为进士群体的仕宦情况,这亦为判断其刊刻年代提供依据。文库本履历便览中若干科即可据此断定系较晚出的版本,兹列表 1 如下:

表 1 各科履历便览资料的时代下限

科份	最晚出现年代	旁证
顺治三年	(匡兰兆)己丑(顺治六年)巡按浙江	《清世祖实录》卷四四“六年五月癸未”
顺治六年	(周体观)乙未(顺治十二年)升江南副使池太道	《清世祖实录》卷九四“十二年十月甲子”
顺治九年	(程邑)丙申(顺治十三年)外放苏州府教授	《〔同治〕苏州府志》卷七三
顺治十五年	(王养晦)甲寅(康熙十三年)保举武昌府理刑同知	《〔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四
顺治十六年	(吴琯)乙卯(康熙十四年)升中书舍人	
顺治十八年	(杨枳)壬戌(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内缘事(下缺)	
康熙六年	(纪愈)丙辰(康熙十五年)钦差提督龙江西新关税务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五《职官志》载康熙十六年,说明刊刻时间不早于十五年
康熙九年	(汪鋐)辛酉(康熙二十年)升吏部验封清吏司员外郎,九月升吏部考功司员外郎	
康熙二十一年	(刘骊)戊寅(康熙三十七年)升稽勋司郎中	

①《重订嘉庆七年壬戌科会试齿录》,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光绪六年庚辰科会试同年齿录》,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

②俞樾:《茶香室三钞》卷二四《西河沿洪家老铺》,《茶香室丛钞》第 3 册,中华书局,1995 年,第 1350 页。

此外,康熙五十二年癸巳科履历便览中虽未出现更晚的纪年,但所载进士仕宦经历有迟至康熙五十六年者:如杨克慧任大同府教授、苏滋恢任杭州府教授、蒋如松任平乐府教授^①,可知其亦为晚出之本。

其余十五科履历便览则系殿试当年所刻,除顺治十二年乙未科外,各书仅有进士选庶吉士的记载。根据《实录》所载馆选年月,可知康熙三年甲辰、十二年癸丑、十八年己未、二十四年乙丑、二十七年戊辰、三十九年庚辰六科履历便览刻于当年五月以后^②,康熙十五年丙辰、三十三年甲戌、四十二年癸未、四十五年丙戌、五十一年壬辰五科履历便览刻于当年四月以后^③,康熙三十年辛未、三十六年丁丑两科履历便览刻于当年六月以后^④,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刊刻于当年三月之后^⑤。

初刻本履历便览在诸人条目下均留有大量的空白未刻,正是为日后增补所留,而由表1可知,个别科份的履历便览在十馀年后仍在增补刊行。顺治十二年乙未科履历便览为了解这一续补过程提供了范例。该科履历便览除内阁文库外,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一阁均有藏,但版本不同。马镛、吴宣德比对国图本与上图本,认为上图本系殿试当年刊刻,而国图本则成书于康熙十七年以后^⑥。文库本晚于上图本,但与国图本又有出入。常建、汪观、王发祥、贺王昌、朱际明等进士在上图本中无生日,文库本、国图本有增补,但文字有异,如常建,文库本记其生日为“己巳年二月初四日”,国图本记为“己巳年二月初十日”;汪观,文库本记其生日为“戊午年六月二十日”,国图本记为“乙丑年六月二十日”;王发祥,文库本记其生日为“甲子年十一月初九日”,国图本记为“丁巳年十一月初九日”。此外,国图本、文库本中进士家状的个别文字亦有剗改。如归泓曾祖父之名,上图本作“李周”,国

①分见《〔乾隆〕大同府志》卷一〇一、《〔乾隆〕杭州府志》卷六二、《〔雍正〕广西通志》卷五八。

②《清圣祖实录》卷二〇“康熙三年五月丙子”;卷四二“康熙十二年五月己卯”;卷八一“康熙十八年五月庚戌”;卷一二一“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庚申”;卷一三五“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壬午”;卷一九九“康熙三十九年五月癸卯”。

③《清圣祖实录》卷六〇“康熙十五年四月癸酉”;卷一六三“康熙三十三年四月庚辰”;卷二一二“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庚寅”;卷二二五“康熙四十五年四月乙卯”;卷二五〇“康熙五十一年四月辛未”。

④《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二“康熙三十年六月乙卯”;卷一八四“康熙三十六年六月乙巳”。

⑤《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七“康熙四十八年三月乙卯”。

⑥马镛、吴宣德:《两种善本〈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会试进士三代履历便览〉之比较》,《图书馆杂志》2009年第11期,第70-73页。

图本作“学周”，文库本则写作“孝周”。从进士仕履来看，文库本中时间最晚者为洪士铭“本年九月授礼部仪制司主事”，此系顺治十二年事^①，此外亦有多条是年八月外放地方官的记载。据此可以推知，文库本最早应刊行于顺治十二年九月，是上图本刻成不久后的增补本，而该科履历便览在二十馀年后仍在续补。由于现存履历便览种类有限，难以获得更多同科异本的例证，履历便览初刻成书后是否定期增补、其信息来源为何，仍不甚清楚。不过从顺治十二年履历便览的情况来看，后续所补不仅在于仕履，更涉及家系、生年，说明初刻时书坊获得的信息相当有限，而文库本、国图本在生年上的歧异亦可见书坊的信息来源较为复杂多元，恐不尽来自于士子应试时呈报的家传。

内阁文库藏本中还包括三种被误著为“履历便览”的登科录。此种进士题名册为官方编刻颁发，并非坊刻售卖。其刊行情况在清初并不固定，顺治、康熙两朝变动频繁。顺治二年确定殿试揭榜后刊刻登科录，其后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八年、康熙十四年至二十三年间两度停刻^②。因此清初会试登科录之罕见，乃并未刊刻，而非散佚不存。登科录刻印后需先向皇太后、皇帝、皇后各进呈一本，乾隆二十八年以后停止向皇太后和皇后进呈之例^③，每位新科进士“赴监释褐毕，则大司成各以一部授之”^④。登科录的刊刻由顺天府承办，经费由户部拨付且十分充裕，如乾隆元年丙辰科会试录、登科录即耗银八十二两。其版式与印刷亦远较坊刻的履历便览精美，“原书上等开化纸所钞，广尺有奇，修二尺弱，蝇头细书，极精。首有礼部印，书衣用黄色重绫，固可珍之品也”^⑤。

二、内容与史料价值

进士三代履历便览及登科录作为科举题名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进士群体、科举家族、科举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对于考察明清

①《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史料》第3册，台北维新书局重印本，1972年，第551页。

②法式善：《槐厅载笔》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178册，第354页。

③《〔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六七《礼部·仪制清吏司》，《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07页。《清高宗实录》卷六九七“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丁未”。

④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262册，第675页。

⑤《乾隆十九年甲戌科会试录》，《中国科举录续编》第2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1年，第193页。

时期行政区划变动、设官分职概况等相关问题的价值亦受到学界的重视。国内所藏顺治、康熙两朝履历便览主要集中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与天一阁,但残缺较多。相较而言,文库本的优势在于历科相对完整且连续,具体情况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顺治、康熙两朝履历便览收藏情况表^①

年份	国图	上图	天一阁	内阁文库	年份	国图	上图	天一阁	内阁文库
顺治三年			●	●	康熙十八年	●		●	●
顺治四年			●		康熙二十一年				●
顺治六年	●		●	●	康熙二十四年	●		●	●
顺治九年	●	●	●	●	康熙二十七年				●
顺治十二年	●	●	●	●	康熙三十年				●
顺治十五年	●		●	●	康熙三十三年			●	●
顺治十六年	●		●	●	康熙三十六年				●
顺治十八年	●		●	●	康熙三十九年		○		●
康熙三年			●	●	康熙四十二年	○	○		●
康熙六年			●	●	康熙四十五年				●
康熙九年			●	●	康熙四十八年				●
康熙十二年	●		●	●	康熙五十一年				●
康熙十五年	●		●	●	康熙五十二年				●

说明:藏有刻本者以●标识,藏有抄本者以○标识

这种连续性使得文库本履历便览对于补充重要历史人物的基本信息和仕宦经历、探究清初士人的知识趋向、理解清初职官制度的渐进性演变与政制特色等方面皆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一手材料。

(一)

履历便览载录进士的家系、生年与仕履,对于清初人物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国史馆纂修大臣列传在顺治、康熙两朝并未形成定制,导致清初一些显宦重臣的生平细节晦暗不清。特别是对于八旗官员而言,存世碑传远少于汉官,其家世与早年经历更不易厘清,履历便览则了解此类细节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其一是对于人物生年或生日的补充。如雍正年间曾任户部侍郎的单畴书,系康熙三十六年进士,履历便览载其生于己酉年(康熙八

^①史料来源:《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第3册,第1026-1027页;江庆柏编著:《清朝进士题名录》下册,第1951-1953页。

年)正月初五日。该科亦有出身汉军世家的蔡珽,雍正初年甚得世宗信任,官至吏部尚书,生于丁巳年(康熙十六年)十月十八日。重臣赵申乔之子赵凤诏,康熙末年坐贪处死,其人系康熙二十七年进士,生于己酉年(康熙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另如年羹尧,学者此前曾据档案与朝鲜史料参酌互证,考订其生于康熙十八年,但月日不详^①。据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履历便览,年氏生于庚申年(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其二,履历便览中的“家状”记载丰富了人物的家世信息。如雍正年间曾任大学士的徐元梦,虽有碑传传世,然其家世信息不详,康熙十二年癸丑科履历便览载其“曾祖法库台,祖伍巴大,封他赤哈哈番,父尔西泰,他赤哈哈番加一级”,可知其出身满洲低阶文官家庭。其三,对于国史无传、碑传无存且亦未见其他史料记载的进士,则可由履历便览中的简短记载略知其个人情况及早年经历。如康熙前期曾任湖广巡抚的张汧,系明珠朋党中的重要人物,其人无传记存世,早年经历不详,据顺治三年丙戌科履历便览:

张汧,(字)蕙蝶,礼记房,壬午四月初八日生,高平人。乙酉五名,会试三百一十八名,三甲一百九十六名,考选庶吉士,丁亥改礼部主客司主事,己丑升仪制司员外。曾祖齐,诰封陈州知州。祖国纲,乡饮正宾。父鉴,生员。

与张氏同时,曾任两江总督、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董讷,仅在《清史稿》中有百餘字的小传^②,皆为其任总督后的事迹。据康熙六年丁未科履历便览:

董讷,(字)默庵,诗经,丙戌年十月二十五日生,平原人。丙午十七名,会试一百三十□□□□院编修。曾祖遇春,祖振秀,原任福建兵备道,崇祀乡贤。父允祯,拔贡生。

可补其家系与早年经历之缺。

(二)

除在细节上可为人物研究补证外,由于文库本履历便览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亦可从整体上了解清初士人的经典修习情况。履历便览卷首一般分房(开列同考官及进士名单)或不分房(在总裁、同考诸官名单之后)按照修习经典开列本科进士的总名单,个别科分无此名单,但每人条目下均列有所习经典。根据文库本中列有总名单的履历便览,可以将清初历科会试所习经典状况列表3如下:

^①张书才:《年羹尧生年考实》,《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第103-105页。

^②《清史稿》卷二七九,中华书局,1977年,第10123-10124页。

表3 清初各科所习经典人数统计表^①

年份	易	诗	书	春秋	礼记	名单总数/ 书名中总数	进士 人数
顺治三年丙戌科	120	△136	85	31	△28	400/400	373
顺治六年己丑科	119	△132	85	31	28	395/400	395
顺治九年壬辰科	129	139	86	28	△29	411/407	397
顺治十二年乙未科	117	125	85	30	28	385/385	399
顺治十六年己亥科	108	121	71	24	26	350/350	377
顺治十八年辛丑科	117	134	88	30	31	400/400	383
康熙三年甲辰科	45	52	31	11	11	150/无	200
康熙九年庚戌科	94	106	67	21	20	308/308	299
康熙十二年癸丑科	48	55	34	12	10	159/159	166
康熙十五年丙辰科	60	71	48	16	14	209/209	209
康熙十八年己未科	44	51	31	13	11	150/无	151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科	59	66	42	18	15	200/200	179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科	44	50	32	12	12	150/150	164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科	44	51	31	13	11	150/150	146
康熙三十年辛未科	47	54	31	13	11	156/156	157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	45	55	33	13	12	158/159	168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科	46	53	35	12	13	159/159	150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	94	99	61	23	23	300/300	305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	50	52	34	14	12	162/162	166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科	89	106	64	26	26	311/315	290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	90	105	64	22	22	303/303	292

①此部《进士履历便览》中存在书页污损或刻印不清的情况,故统计表主要依据卷首所列进士总名单编制(按,关于每科进士治经人数,可通过书前进士总名单或总名单之后的每人条目记载两种方式统计,但因部分书中条目残损严重,若按条目逐一统计,则所得数据并不完整,因此本文仅据总名单进行统计。由于顺治十五年、康熙六年两科,书前无此总名单,而书中条目又多无法辨识,故表格中不录此两科)。表格中“△”表示名单有污损模糊处,“名单总数”指五经名单中进士的总数,“书名中总数”指每科履历便览书名中提到的该科进士总数(如《康熙九年庚戌科会试三百八名进士履历便览》,“三百八名”即为“书名中总数”),“进士人数”则以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为准。

(续表)

年份	易	诗	书	春秋	礼记	名单总数/ 书名中总数	进士 人数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	49	53	31	16	12	161/195	177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科	57	59	45	13	12	186/186	196

虽然清代会试专重首场四书文,并无按五经修习人数依比例录取的规定,但清代会试五经修习人数所占比重相对固定,前后并无明显变化,《易》《诗》《书》为大宗,《春秋》与《礼记》则因篇幅长、难度大而较少有人修习,这与明代的状况颇为相近。就分房情况来看,《春秋》与《礼记》历科仅分一房,《书》则通常分作四房,仅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分三房,至于《易》《诗》,顺治朝各分六房,康熙朝则各分五房。此外,因履历便览按地域划分,每人条目下注明所习经典,亦可了解地方五经修习的具体情况,对于探讨清初地域专经、明清地方经学家族的盛衰均有参考意义。即以明代习《春秋》风气极盛的江西吉安府安福县为例,顺治三年至康熙五十二年间(顺治四年、康熙十五年未计^①),该县共产生13名进士,其中8人修习《春秋》^②,可见此种地域专经的状况在清初仍在延续。

(三)

履历便览对清初职官制度以及某些特殊政治现象亦有揭示。该文献连续出版、反复补充刻印的特征使其成为实时观察清初政制渐进演变细节的重要史料,而这些零散信息多为其他史料所不载。如三藩问题为清初要政,但关于藩王属下人的史料却相当有限。顺治十二年乙未科履历便览记载了靖南王耿继茂之子耿效忠的早年经历,“(字)江龙,诗六房,乙亥年十一月初四日生,满洲广东广州府人。甲午二十二名,会试三百七十一名,三甲二百九十名。本年九月授大理寺右评事”。康熙十二年癸丑科进士葛鸣鹄系平西王属下人,履历便览记其为“顺天籍平西亲王人”。这种兼举八旗身份与省份的格式,是清初八旗汉军书写籍贯的常见表述,正可见第一代汉军旗人由民入旗的双重身份认同。再如顺治初殿试总裁官范文程、刚林皆非进士出身,故于职衔中特加“榜式”字样,晚清时人阅读顺治初履历便览时已注意到此问题,“范、刚二公皆加榜式二字,榜式即笔帖式”,“文臣加榜式,犹武臣

①文库本缺顺治四年履历便览,康熙十五年履历便览中浙江、江西及四川部分残缺。

②分别为顺治十二年伍柳、十五年颜象龙、十八年王吉,康熙六年王嘉禄、二十一年邹球、三十六年康五瑞、三十九年马国屏、刘孟弘。

加巴图鲁名号也,是皆足资掌院”^①。又如清初政制改动频繁,顺治六年复定内三院官制,每院设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诸官。顺治六年己丑、九年壬辰两科履历便览似对此官制体系有所补充,总裁官名单中出现“内翰林秘书院掌院事大学士榜式范文程”“内翰林国史院掌院事大学士榜式刚林”“内翰林弘文院掌院事大学士祁充格”等记载,“掌院事大学士”或为各院大学士之首。

(四)

不可否认的是,履历便览出自坊刻,旨在盈利,其记载未必完全完整、准确。特别是与登科录、缙绅录等一次性编刻而成的题名文献不同,履历便览系陆续增补刊刻,由于书坊的信息来源有限,每次增补的内容并不全面,以致履历便览中进士仕宦经历的更新程度颇为参差。如前文已考证文库本顺治六年履历便览刊刻于顺治十二年以后,其时该科进士王庭已任广西按察使司副使分巡府江兵备道^②,但此份履历便览仍作“本年钦授广东广州知府”,“本年”系顺治七年^③。再如文库本顺治九年履历便览刊刻于顺治十三年以后,书中进士李恂的任官经历仅记作“授礼部精膳司主事”,但早在顺治十年七月其已外任河南按察使司僉事^④。信息之迟滞,由是可见。

更重要的是,部分年份的履历便览会同时存在累次增补、续刻的情况,这主要反映在进士仕履中“本年”的具体年份所指不同。顺治六年己丑科履历便览尤为明显,书中所载进士群体授官任职的时间既有作“本年”者,又有以干支纪年者,而“本年”所指年份并不统一。借由这些层累的时间和信息或可一窥该书版的续刻情况,以及此科年履历便览在顺治十二年之前可能存在的版本。具体来看,该书所载吴道煌“本年授浙江武康知县”、苏腾凤“本年授陕西石泉知县”、王庆章“本年钦授广东海南道右参议”等十四处可考信息系顺治六年事^⑤;杨行健“本年授陕西蓝田知县”、蔡祖庚“本年授陕西甘泉知县”、董巽祥“本年授山西紫阳知县”等七处可考信息系顺治七年事^⑥;

①邵懿辰:《明万历戊戌至国朝康熙壬戌进士履历跋后》,《中国科举录汇编》第14册,第519页。

②《清世祖实录》卷八八“顺治十二年正月癸巳”。

③《〔光绪〕广州府志》卷二三《职官表七》,《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6册,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396页。

④《清世祖实录》卷七七“顺治十年七月乙未”。

⑤分见《〔道光〕武康县志》卷十七,《〔康熙〕宁津县志》卷六,《清世祖实录》卷四四“顺治六年五月壬午”。

⑥分见《〔雍正〕蓝田县志》卷二,《〔雍正〕陕西通志》卷五三,《〔道光〕紫阳县志》卷四。

杨元勋“本年授湖广醴陵知县”、尹明廷“本年钦授广西平乐府知府”、杨模圣“本年钦授广东廉州知府”等八处可考信息系顺治八年事^①；汪继昌“本年钦授广西江左道右参议”、王嗣皋“本年钦授广西桂林知府”、葛天骅“本年钦授广西南宁知府”等四处可考信息系顺治九年事^②；黄中通“本年授广西太平知府”系顺治十二年事^③。由上可知，此份履历便览中“本年”先后指代顺治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二年五个年份，每次续刻时并未改刻书版上指代其他年份的“本年”字样。此外，本书记载进士周体观在顺治十二年的任官经历时，作“乙未”而非“本年”，此条目应系顺治十二年当年续刻后再次补版。综上，此科年履历便览或刊行过六个版本。顺治九年壬辰科履历便览亦是如此，如张曜“本年授江南兴化知县”、孙如林“本年授河南祥符知县”为顺治九年事^④，而刘大漠“本年授河南光州知州”、张厥修“本年授浙江嘉兴知县”则系顺治十年事^⑤，同时书中还并行癸巳（即顺治十年）、丙申（顺治十三年）等纪年，显系书坊不断续刻而成。概言之，履历便览虽提供了人物生平研究的大量细节，但其记载必须经过审慎对勘，特别是进士仕履宜尽可能地参酌《实录》与方志中的授官记录，庶不致为其中指向模糊的“本年”所误导。

三、清代科举录的流转、收藏与阅读

履历便览与登科录、同年齿录等文献，虽体例、编刻者不同，但其实质均为科举题名文献，是科举考试的衍生品。此类文献的价值和意义因收藏者和阅读者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时人经此获得科第取中的情况，而后人则借此了解前代或国初的朝章典故。需要指出的是，履历便览自雍正以降不再刊印，官刻的登科录与私纂的同年齿录成为之后科举题名文献的大宗，故本节所论虽以履历便览为中心，但不拘于此，以见此类文献流转、阅读与收藏的整体情况。

科举题名文献在刻印之初，主要作为查阅中式情况的参考而广为传播，其价值正在于时效性。借助于明清时期日益成熟的商业书籍流通网络，书贾在榜发之后迅速将题名文献贩售至各地。晚明剧本《焚香记》中便有托请贩售登科录的书贾代为传递家信的情节，正因“常年有卖登科录的往各处

①分见《〔嘉庆〕湖南通志》卷八〇、《〔雍正〕平乐府志》卷五、《〔康熙〕广东通志》卷十四。

②分见《〔雍正〕广西通志》卷五七、卷五七、卷五八。

③《〔雍正〕广西通志》卷五八。

④分见《〔康熙〕兴化县志》卷六、《〔顺治〕祥符县志》卷三。

⑤分见《〔顺治〕光州志》卷七、《〔康熙〕嘉兴府志》卷十四。

去”^①，足见其行销范围之广。题名文献的流传速度颇为可观，士人常通过阅读当科名录以获知友朋中式的信息。如康熙六年殿试后，陈僖致信该科状元缪彤，即称“读试录，知阁下获售，不胜辄然喜也”^②。乾隆十五年，卸任湖南学政回京的夏之蓉在途中获见广东乡试题名录，乃知友人曹鹭峰、梁春叔同时中式，则乡试题名文献在外省亦有流传^③。类似情节在晚明清初的小说、戏文中亦有反映，限于篇幅，不能备举，不过亦可从侧面说明科举题名文献的传播速度与时人对此的关注程度。

对于中式者而言，题名文献的意义在于备查考、叙年谊，其汇集同年的信息，成为中式者的“交游录”。随着同年关系网形成以及往来加深，士人不断在科举录上补充信息。如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进士李祖望，便在该科登科录上批注了近八十位同年的字、号^④。又如咸丰六年丙辰科状元翁同龢在该科同年齿录上补记了谭锺麟、何枢、薛允升、薛桂一、沈秉成、夏同善等同年的仕宦经历、家庭及亡故情况，这些批注系数十年间陆续添加，最晚一条已至光绪十六年^⑤。翁同龢之侄翁曾源为同治二年癸亥科状元，他在当科题名录上同样补注了同年字、号、排行与授官等情况^⑥。除中式者外，会试考官、殿试读卷官亦常常通过题名文献了解门生的情况。翁同龢为光绪六年会试副考官、光绪十六年殿试读卷官，他于六年庚辰科齿录中批注了韩仲荆、余效衡、查荫元等数十人的仕宦经历，而在十六年齿录中主要补注了中式者字、号与所习经典^⑦。

坊刻的履历便览在雍正以降不复刊刻，官方编纂的登科录与试录皆仅于当年刊印，限于体例，收录信息有限，且无法持续更新。因此，雍、乾以后的中式者热衷于“相从订齿录”^⑧，以补官方名录之不足。以嘉庆十九年刊行

①王玉峰：《焚香记》第二十出《托寄》，中华书局，1989年，第49页。

②陈僖：《燕山草堂集》卷一《与缪状元书》，《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17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00页。

③夏之蓉：《半舫斋编年诗》卷十三《阅岭南登科录曹鹭峰梁春叔同时获隽书此以寄并问讯茹三樵》，《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25册，第741页。

④《康熙五十一年登科录》，《中国科举录汇编》第14册，第454、463、465、467页。

⑤《咸丰六年丙辰科会试同年齿录》，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

⑥《同治二年癸亥恩科进士题名录》，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

⑦《光绪六年庚辰科会试同年齿录》，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光绪十六年庚寅科会试录、金榜题名录》，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

⑧金性：《静廉斋诗集》卷十六《同年觉罗奉硕亭少司马挽诗》，《续修四库全书》第1440册，第562页。

的《重订嘉庆七年壬戌科会试齿录》为例,该科同年不满于“旧录编次未全,版又散佚”,遂拟重订续刊,推举洪耀主持其事。洪氏耗时十八个月,“酌为例言,补其阙略,于已故者尤不敢忽”,“刊刻资本悉由公项开支,版片亦收归公所存贮,其齿录按名分送一部,如有欲刷印以备遗失者,每部交京纹一两,即行装订邮寄”^①。齿录的订补与续刊,成为该科进士联络同年、重叙旧谊的机会。这种“实用性”在士人交往中更为常见,清代小说中多有关于查齿录、认同年、叙年谊的情节。

乾嘉之际,本朝掌故日益引起士大夫的兴趣,而清初的科举录、缙绅录等各类题名文献遂成为士大夫讲求“国初故事”的重要参考^②。事实上,由于时人仅重视此类文献的实用价值,鲜少有专意收藏者,因此至乾隆末年,清初的科举录已难见全帙。法式善积三十年之功纂辑《清秘述闻》,期间着力搜集顺康雍三朝科举录以编录考官名单,曾自述其搜求历科题名录之艰难:

中缺四科同考官姓名,致书十五省学院,复于每科会试公车抵京展转咨询。三五年来,吴江陈芝房学正毓咸寄康熙丙戌会试录至,申州藩司方保厓维甸寄康熙己丑会试录至,新安令杜梅溪群玉寄康熙壬戌会试录至,遂得陆续补梓,惟兹录(笔者按,雍正四年顺天乡试录)阙如,直隶各学官遍访不获。一日,宿吴衣园前辈接叶亭,语及,翌日持一册至,即此书也。披阅一过,如获异宝,赋诗以纪。^③

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顺康雍三朝会试题名》抄本,钤“时颿珍秘”与“诗龕居士存素堂图书印”印,抄录考官名录和部分科的进士名录,中式者的信息一概略去,当系法式善纂辑《清秘述闻》时所抄存。其中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的考官名录即为陈毓咸寄示,后法式善又另得一份带有分房中式名单的抄本,将两种合并装订,并题识云“因系陈芝房□□自吴江寄到,故珍惜之,附装于此”^④,可见搜求之不易。

①分见《重订嘉庆七年壬戌科会试齿录》卷首《重订壬戌齿录例言》、卷末洪耀《重订齿录跋》并附陶澍《洪守愚同年重订壬戌齿录告成赋五言六十韵纪之》,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

②清人搜求前代科举题名文献的兴趣早已有之,如宋《绍兴十八年戊辰科同年小录》、《宝祐四年丙辰科登科录》,因其版本之早且分别为朱熹、文天祥所中之科,素为清人珍重。用前代题名录考史者亦不乏先例。雍正时修《江西通志》,《选举志》中明代进士名单即已参考历科登科录订正。

③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十五《题雍正丙午顺天乡试录后序》诗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76册,第578页。

④《顺康雍三朝会试题名》,《中国科举录汇编》第16册,第369、373、377、403页。

因罕见之故,清初的会试题名文献在乾嘉以降已成为士大夫颇为看重的收藏,而履历便览因雍乾以后不复刊行,故尤为珍贵。法式善自云“得顺治壬辰、乙未、戊戌三科会试齿录于曲阜颜氏,叙次款式与今通行本异,卷后有雕板于京师正阳门外西河沿浙江洪氏书坊”^①,既为洪氏刻本,且“与今通行本异”,则其所见当非齿录,而为履历便览。道光年间,邵懿辰所集晚明清初二十八科履历便览中,即涵盖顺治朝完整八科及康熙二十一年之前七科。邵氏藏本数量之丰,在当时亦属少见。邵懿辰为每科履历便览作跋之时曾忆及收集经历:

右进士三代履历便览,起万历二十六年戊戌,迄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中脱万历丙辰、己未、天启壬戌三科,凡二十八科。道光戊戌,余得之杭城弼教坊沈雨溥书肆,其末三科乃沈辅之水部所赠家藏零本,吴山书贾陶在田排比潢治,今以归韩小亭农部。^②

道光二十年,邵懿辰将此书从杭州带至京师,请何绍基作跋后赠予韩泰华。此部履历便览的实际阅读者远不止于此。张穆与邵、韩二人过从甚密,其为顾炎武、阎若璩编撰年谱,有多处以顺治、康熙两朝履历便览考略清初进士,且未引及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科以后的部分,张氏著书时或当参阅过邵氏藏本。

从法式善和邵懿辰收藏的经历大致可见清初历科履历便览在乾隆末年至道光年间传播与阅读的主要线索。国子监学正陈毓咸、直隶总督方观承之子方维甸、新安知县杜群玉、翰林院编修吴裕德(衣园)、内阁中书邵懿辰、翰林院编修何绍基、工部主事沈映铃(辅之)及户部员外郎韩泰华等人均曾留心于清初的科举题名文献。而邵懿辰、韩泰华作为颇负盛名的藏书家,同时亦收藏有数种清初缙绅录。

当履历便览等题名文献进入士大夫收藏之列,其用途便逐渐由“实用”向“考史”过渡。法式善感喟“事隔百馀年,至有不能举其颠末者,不有此书,何以征信”^③,何绍基则称诸科履历便览“足资明末清初人物职官掌故者甚多”^④。龚自珍少年时获见旧年科举录,慨叹“科以人重,科益重人,以科传

①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卷三《纪晓岚尚书藏顺治十八年缙绅跋》,《续修四库全书》第1476册,第710页。

②邵懿辰:《明万历戊戌至国朝康熙壬戌进士履历跋后》“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中国科举录汇编》第14册,第536页。

③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卷三《纪晓岚尚书藏顺治十八年缙绅跋》,《续修四库全书》第1476册,第710页。

④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卷五《二十八科进士履历便览书后》,《续修四库全书》第1529册,第171页。

人”，由此开始“蒐辑二百年科名掌故”^①。时移事易，后代士人更多地视前期科举录为“史料”，其阅读时多关注书中涉及的掌故。如邵懿辰逐一披阅晚明清初二十八科履历便览后分别作跋，指出可资考证政制、史事、人物的内容。如其在顺治九年壬辰科跋文中对该科履历便览出现的音写满文官职加以解释，“郎廷弼下注云国史院他岂哈哈峰，迟煌下云吏部他赤哈哈峰，刘景荣下云通政司笔帖式哈峰。哈峰即哈番，译言官也”；在康熙六年丁未科跋文中则提及当时会试、乡试考官多由举人破格担任的特殊现象，并称“国初用人不拘资格如此”^②。科举废除后第二年，缪荃孙阅读顺治九年壬辰、十二年乙未、十五年戊戌三科履历便览，后整理出三科总裁官、科举员额、分房情况、名臣循吏及中式之官宦子弟等内容^③。

进入民国年间，清初的进士题名文献已难得一见。前述法式善抄存的会试题名，辗转由朱文钧收得，傅增湘曾借抄一部，“以备科名故实”^④。邵懿辰为所收二十八科履历便览逐一作跋，瑞安孙氏将之汇抄为一册，后又转归邵懿辰之孙邵章所有。至于此前藏家不甚留意的清中后期诸科题名文献，此时已弥足珍贵。邵章即藏有嘉道年间试录及齿录数种：

余近年蒐得道光齿录甚夥，惟壬寅重刻乙未会试录甚精，丙午重刻壬辰乡试次焉，合装以存故实。洎甲子秋，则得嘉庆甲戌重刻壬戌会试齿录，中间龚守正下有续纂之字，友人谓为定庵书，良足宝也。^⑤

风气所致，在民国年间的书肆中索价甚昂，乾隆十九年的会试录在琉璃厂已售至三十圆，藏家难以购置^⑥。

①《碑传集补》卷四九《定庵年谱稿本》，《清碑传合集》第5册，上海书店，1988年，第3707页。

②邵懿辰：《明万历戊戌至清康熙壬戌进士履历跋后》，《中国科举录汇编》第14册，第522、530页。

③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卷八《顺治壬辰乙未戊戌三科齿录跋》，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诗文》第1册，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425页。按，缪氏所见三录“分府分县，不依名次，与今不同”，实为履历便览。

④《顺康雍三朝会试题名》，《中国科举录汇编》第16册，第249页。

⑤《重订嘉庆七年壬戌科会试齿录》卷末邵章跋，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

⑥1933年，王修获见乾隆十九年会试录，“索价三十圆，余爱其卷帙甚大，书迹秀茂，畀千金拟留之，坚不肯”（《乾隆十九年甲戌科会试录》，《中国科举录续编》第2册，第193页），不得已只能抄存一份。

四、结语

随科举考试出现的科举录向来受到士人的关注,清人收集阅读科举录不仅在于其传递科举信息的实时性和连续性,还将其视作了解本朝史事的可靠史料,因而自清中后期以后清初科举录成为士人着意搜求的对象。此类科举题名文献对于考订清代科举制度,清初史事、制度以及人物生平均有重要意义。国内所藏清初履历便览种类有限,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在时间跨度上的连续性正可补国内藏本之缺,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如前所述,不同于一次刊成的会试录,履历便览在初刻后仍不断进行增补、修改,在时限上甚至可以长达二十余年,由此造成了“同科异本”的现象。因此,对于海内外现存的履历便览,仍需要进一步系统搜集、对勘,考订其刊行年代,尽可能探明同科履历便览的确切版本情况,以期了解清初坊刻题名文献的生成机制。

【作者简介】陈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清代政治史。